



讀「大唐西域記」

幻生

(續上期)

現在流行的「大唐西域記」版本，都是印着「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，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。」這一形式，從版本研究，已是很久很久的事了。商務編審會，也就根據這一點，肯定「大唐西域記」是玄奘譯，辯機撰的，做爲他們的理由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告訴商務編審會，這一版本的形式，雖然流傳很久，但顯然是從古代沿襲下來的錯誤，不足爲據。道宣在「大唐內典錄」卷十裏

明白地記載：「皇朝坊州玉華宮寺沙門釋玄奘撰大唐西域傳一十一卷」。此處用玄奘撰，不用玄奘譯。道宣與玄奘爲同時的人，年長玄奘數歲，並參與玄奘譯場，擔任執筆刪綴詞理的工作。續高僧傳卷四說：「余爲執筆，並刪綴詞理。」(大正五〇·四五五上)道宣寂於唐高宗乾封二年(六六七)十月，又畧遲玄奘三年。玄奘的事跡，道宣知道最清楚的。道宣在續高僧傳裏爲玄奘作的傳記，也是記得最詳細的，文字最多的一篇傳記。從現存的玄奘歷史資料來看，除了算詳寫的「玄奘行狀」，可能是最

早出現的史傳之外，其次便是道宣續高僧傳中的「玄奘傳記」了。至於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」，則是又後出的傳記。這是研究玄奘歷史的人，大多一致承認的。所以，道宣「大唐內典錄」的這一記載，除了上引當事人的文證之外，這是一個有力的重要歷史證據。關於辯機與「大唐西域記」的關係，只是擔任的撰錄工作。道宣在「玄奘傳」裏說：「微有餘隙，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，沙門辯機，親受時事，連紙前後。」（大正五〇·四五五上）智昇在「開元釋教錄」卷八也說：「大唐西域記十二卷，見內典錄，貞觀二十年奉敕於弘福寺翻經院撰，沙門辯機，承旨綴緝。」（大正五五·五五七中）我們從「沙門辯機，親受時事，連紙前後。」「沙門辯機，承旨綴緝。」以及辯機本人所寫的「爰命庸才，撰斯方志。……恭承志記，倫次其文，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！」這些文字所記，其意並不矛盾，大體是一貫的，我們可以知道辯機在「大唐西域記」究竟擔任的一個什麼角色。明白地說，他只是聽玄奘口述之後，去做文字的記錄整理工作。可是，商務編審會，却無視這些文獻的記載，竟肯定「大唐西域記」，是玄奘譯，辯機撰的，真是怪事！

此外，我更告訴商務編審會，古代佛經翻譯，不比現在私人從事翻譯的情形一樣。凡是奉皇帝詔命翻譯的佛經，其譯場的規模組織都是相當嚴謹龐大的。如玄奘的譯場裏，據道宣續高僧傳所記，有證義、綴緝、錄文、證梵語、定字僞各部門，每一部門又有若干專門人才主持，所以，佛經的翻譯，是夠嚴謹的。既然稱之為譯，當有梵文原本為根據，易梵為漢，名之為譯。「大唐西域記」，根本沒有梵文原本，玄奘根據什麼而譯？這是事實問題。

「大唐西域記」前面，寫成「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；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」，這一形式，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？我們現在雖然沒有查出，但這一形式，決不是「大唐西域記」的最初原始形式，此事我們可以肯定的。這次我讀的「大唐西域記」校勘本，便將「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；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」並列的二行字，改為「三藏沙門玄奘奉勅撰」。此處有一注釋符號，後面注

釋中說：

三藏沙門玄奘奉勅撰，今傳世印本大唐西域記，此行皆分兩行作：

「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

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」

蓋本書原由玄奘指授，辯機執筆綴緝而成（見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及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八），並列兩人之名，亦其所宜。但西域記為玄奘奉詔所修，當時卷首題署例不得以辯機之名與玄奘並列。慧琳一切經音義（卷八二）題作「三藏沙門玄奘奉勅撰」，蓋所見唐本加此，今據改。以下各卷同。（見該書第四頁）

慧琳的「一切經音義」第八十二卷，題為「大唐西域記卷第一，三藏沙門玄奘奉勅撰」（大正五四·八三六下）。由此可見，在唐代的題署，只列玄奘一人名，未列辯機之名。慧琳（七三七——八二〇）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（七三七），寂於唐憲宗元和十五年（八二〇）。慧琳出生，是在玄奘寂後的六十三年，可見其時流傳的「大唐西域記」，沒有辯機的名字。這次我又細查了一遍各種經錄，除上所引「大唐內典錄」卷十，道宣記載「皇朝坊州玉華宮寺沙門釋玄奘撰大唐西域記一部一十二卷」之外，圓照「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」卷二十七，也記載「大唐西域記十卷，大唐三藏玄奘撰」。我們知道，從初唐、中唐，乃至晚唐出現的經錄文獻裏，都只列玄奘一人之名。將辯機之名與玄奘並列於卷首的，至少是唐以後的事。

商務編審會爲了強調他們的看法，「大唐西域記」，譯是站得住的，並說「未見釋界對此事有所爭議」。我告訴商務編審會，我是一個出家三十多年的僧侶，我所持的看法就是如此。關於佛門裏對於「玄奘譯」的「譯」字，大家未作爭論，因為這是自古相沿下來的一個錯字，彼此悉知悉見，毋庸爭議。商務編審會不能因佛門對此未作爭議，便認定「大唐西域記」爲玄奘譯的理由。

我的這篇七千字的文章——「大唐西域記」譯撰問題之我見

，發表於「東方雜誌」八卷五期，商務編審會的楊樹人先生，寫了一篇「釋幻生來文書後」，刊在我的文後，對於我的文章，近於光火似的，寫下九點反駁責難的意見。我真想不到，這位好像在胡適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做總幹事的楊先生，現在主持商務編審會，竟然是個久缺修養，類似知識訛詐的人物，根本缺乏了學術研討的風度。大概我所提出的歷史證據，正好推翻了楊先生的「譯是站得住的」理由，所以，而使楊先生近於惱羞成怒。

楊先生寫的九點書後意見，因為該刊不在身邊，我已不能全部記得了，但大體的重要幾點，我還是記得的。首先，楊先生責怪我不應以商務編審會為發言責難的對象，其次並說「大唐西域記」玄奘譯，辯機撰，現在許多知名學者，也贊成此一說法。關於譯的意義，楊先生認為其意甚廣，舉出四種，易古為今，不同語言的傳達等，均名之為譯。不一定要有梵文原本才稱之為譯。末後楊先生責備我，佛們裏既然知道這是一個錯字，為什麼古今以來的版本，一直照錯的印下去，而不加改正？真令他有不可思議的感覺。

讀了楊先生的九點書後意見，我深深地感到今天中國讀書人的悲哀，自己所知不廣，而不肯虛心接受人家的說法與意見，竟視自己的錯誤論斷為無上權威，這顯示近代中國讀書人的幼稚性。我對楊先生的九點意見，自然難以同意接受，所以，我又寫了一篇「讀楊樹人先生『釋幻生來文書後』」，對楊先生的九點意見，一一加以疏釋與反詰。我的這篇文章原稿仍在台灣，不在身邊，但文章的大意內容，我是記得的。現在我就上面提到楊先生的幾點，一一畧述如下：

一、我告訴楊先生，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上海向商務印書館購過一冊「大唐西域記」，卷首印成玄奘譯的字樣，那時我就知道了，可是，我從未寫信向商務印書館提過此事。因為我知道商務印書館是有所本的。這次有某名教授向商務印書館提及「大唐西域記」稱為玄奘譯是欠妥的，楊先生（即商務編審會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認為「譯是站得住的」，但是，「大唐西域記」到底是「譯」是「撰」的問題，成爲一個純學術性的探討研究問題。

學術性的探討研究問題，應該是重客觀性的，崇尚自由公開討論，才能見到問題的究竟真相。我是本於這一心意寫文參與討論的，並非楊先生所說以商務編審會為責難對象。楊先生的看法，既然認定「大唐西域記」是玄奘譯的，「譯是站得住的」，楊先生也應該有這分容忍的雅量，看看我從古籍中提出的相反證據，說明「譯是站不住的」。楊先生假如不同意我引證的資料與看法，儘管再從其它的古典文獻裏尋找證據，成立楊先生「譯是站得住的」理論根據，或是指我所引證的資料有問題不可置信，方是辦法。如果楊先生不能從古籍裏找出證據成立自己的看法，而又視自己的看法為絕對正確，不容別人置喙，這是近代新學閥們的學術壟斷，知識的訛詐，不是一個真正讀書人應該取法的。不幸得很，楊先生竟視我參與這一純學術討論的心意，誤認為向商務編審會的責難，真是遺憾！中國讀書人的傳統美德，是有虛容曠濶的胸襟，尊重對方不同的意見，重視問題的論點，客觀而自由地商討，不要將純學術的討論流於主觀的意氣之爭，那是有失一個學人的風度了。

二、承蒙楊先生相告，現在有許多「知名學人」，贊成「大唐西域記」是玄奘譯、辯機撰的這一說法。筆者慚愧，出家入僧三十多年，一向孤陋寡聞，不知道現在有那些「知名學人」贊成此說。就近代對佛法研究有素的「知名」人物而言，撇開出家僧侶不論，如歐陽竟無、韓清淨、梁啟超、湯用彤、呂秋逸、黃懺華、王恩洋等，他們的著作，大致我都涉獵過，可是，我尚未見到他們贊成此說的文字出現。楊先生所謂「知名學人」，想來一定是指「知名度」極高，而爲大家公認的「學人」，但是，我不知道這些「知名學人」，究竟是指的什麼人？希望楊先生能夠詳細地舉出他們的大名及其著作，讓我開開眼界，增廣見聞，知道他們根據那些典籍資料論究此一問題。或者，我可以爲文向這些「知名學人」公開請教領益。假如楊先生只是信筆而寫，無法舉出這些「知名」度很高的「學人」大名與著作，則就有失一個讀書人的誠實了，流於一種虛偽欺詐；但我不願楊先生屬於此類人物。

（未完待續）